

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

第四辑

(内部读物)

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

第 四 輯

資產階級社會學資料選輯

第四輯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租界路54號)

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2074·306 定價：0.80元

編者說明

本书是《資產階級社会学資料选輯》第四輯，选的是1962年美国《新方向丛书》中的《冲向和平》(Breakthrough to Peace)一书。这是一本論文集，全书共12篇論文和一篇引言，其中有3篇(Gordon C. Zahn: «The Case for Christian Dissent, Herbert Butterfield: «Human Nature and the Dominion of Fear», Joost A. M. Meerloo: «Can War Be Cured?»)，因其內容空泛而譯出后抽掉了。

本书系內部讀物，引用譯文时务請用原著版本及頁碼，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們人力有限，本书在翻譯和編輯等方面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5年3月

冲 向 和 平

托马斯·默尔顿等著

民 清 译

Breakthrough to Peace

Introduction by Thomas Merton

First published as New Directions Paperbook in 1962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本书根据美国《新方向丛书》1962年英文版译出

“原子的分裂已經改變了一切，就是沒有改變我們的思想方式，因而我們就向着無與倫比的浩劫漂流以去。”

——亞爾伯特·愛因斯坦

目 录

托马斯·默尔顿：引言	1
刘易士·门福德：火絕的道德观(原载《大西洋月刊》)	8
湯姆·史东尼尔：在紐約扔一顆氢弹結果将会怎样？(原载《战争/和平报道》杂志)	20
諾尔曼·克欣斯：掩蔽所, 幸存和常識(原载《星期六評論》)	30
艾利契·弗洛姆和迈克尔·马科比：民防問題：答赫尔曼·康恩(原载《評論》杂志)	44
霍沃德·葛儒伯：是人呢, 还是以百万計的人体？(原出版者：民主制度研究中心)	64
托马斯·默尔顿：和平：一个宗教的責任	69
华尔特·斯泰因：西方的防禦(原载作者所編《核武器：一个天主教徒的回答》一书)	101
艾兰·小福布斯：論軍备竞赛	120
杰罗姆·弗兰克：突破思想障碍——核时代的心理挑战(原载《精神病学》杂志)	139
人名对照表	178

引 言

托马斯·默尔顿

托马斯·默尔顿生于一九一五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改宗天主教。一九四六年入肯塔基的特拉比斯特(Trappist)会的盖塞马尼(Gethsemani)的圣母马利亚修道院，一九五〇年领受神职。所著各书中有：《七层岭》、《诗选》、《攀登真理》、《沙漠的智慧》、《新的人和最初的雛型炸弹》——对广岛事件和原子战争的评论。

十九世纪可以被称为和平和舒适的时代，虽然略一回顾，我们会记起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叛变、中国的鸦片战争、普法战争以及血腥而极度野蛮的美国南北战争。尽管有过这些冲突，我们的祖父一辈曾经相信，战争将要逐渐成为往事陈迹。他们不知道，这一切全都是一场巨大斗争的序曲，这场斗争一直在继续撕裂和打碎二十世纪的世界。只是现在到了一九六二年，我们才开始明白：我们的时代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片大火，它熄灭下去时只是为了更猛烈地熾燃起来，它要求狂暴的毁灭的胃口越来越大，并且逐渐威胁到文明人的生存本身。

我们听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悉心预谋；不过是政治战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多走了一步而退不回来了。人们充满信心地和残暴地打了那次战争，所抱的期望是，它将结束一切战争，并使得世界最终而镇定地得到安全，好过自由而舒适的生活。

甚至如那次的条约，本是企图恢复欧洲的顺序并且保证新的冲突不再发生，却造成了第二次、更大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还有过接连不断的和平会议，一连串和平运动，印

度的非暴力革命更不在話下。为了获致永久和平，人們研究，談論，激动，祈禱，忍受。和平从来不曾被說得那么多，而战争也从来不曾如此彻底而普遍地遭到咒罵。軍国主义者当然照样存在，但是不能否认，的确做过截軍的認真努力。这种努力是如此其認真，以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珍珠港事件以前，大多数美国人还在声嘶力竭和矢口不移地反对参战。同时，法国則盲目信賴馬奇諾防綫，一項复杂而費錢的体系，后来被証明在致命的新式进攻性武器面前毫无用处。决不能說盟国当时“要了”战争。但它們是要了一个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經濟局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史无前例和犯罪的惊人恐怖之中，尽管有教皇和传统伦理的其他发言人的抗議，对无防御的平民居住中心的大规模攻击，还是被承认为完全正常的了。人們认为，要打垮“法西斯战争罪犯”的一切抵抗而迫使他們接受那将肯定結束一切战争的无条件投降，系統的恐怖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則是原子弹落到了广島和长崎——这便是这一残忍政策的頂峰。

可是，就在原子弹落下的时刻，美国和俄国之間的冷战就已經在进行了。这种炸弹的威胁，在結束了同日本的热战之后，就要成为冷战的主要武器了。原子弹不但沒有产生和平，反而发动了历史上最荒誕的軍备竞赛。

核威懾已經成为幻想，因为核弹威懾不了任何人。它沒有防止得了朝鮮、印度支那、老撾和刚果的战争。它沒有防止得了俄国对匈牙利叛乱的鎮压。到了现在，那些一度依賴威懾、依賴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的人，正在不知不觉地走向一項执掌率先打击能力的政策。这项政策是由武器本身指定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是完滿的攻击武器，完滿得迄今还想不出防御它的办法。一顆氢弹乃是所有大规模毁灭机器之中最最便宜的。制造一顆只花二十五万美元，而且人們可以沿着大吨*数的梯級一直往上爬，而不致使費用或工程上的困难增大

* megaton, 衡量核武器爆炸力的一种单位，一大吨相当于一百万吨 TNT 的爆炸力。——譯者

到无法問津的地步。据说氢弹比任何现存武器“为每一美元提供更大的破坏力”。既然知道人总是爱做好买卖的，那末这个凶残歹毒的估算当然应该让我们深长思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为和平的激动。人们感到，舆论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运动之毫无用处伤透了心而幻想破灭了。当然，这种幻想的破灭还夹杂着这样一件事实：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和平运动”仅只是苏联宣传战线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冷战当中的另一项强大的心理武器，它在一项说穿了乃是战争努力之中，嘲世不恭地利用现代人最深刻的愿望和最可怜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导向热战或导向革命。处在这种严酷的局势之下，而联合国又过于软弱和空虚，不能为一个约束各民族强国那些无法无天和残酷野心的更高级权威提供任何希望，我们看来正在向着另一场灾难绝望地漂流而去，这场灾难将使一切以前的战争显得象是屋后僻巷里的市声而已。只要每一个国家还是它自己所犯案件的唯一审判官，并且为自己决定是非，除了诉诸炸弹的威力以外就不上诉于什么，那么看来战争决然是不可避免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们现在全神贯注的问题，看来不是战争能否避免，而是战争能否被保持在“安全”限度以内。

处在这种局势之下，问题是太大了，普通人的头脑不能掌握；威胁是太骇人了，他的政治习惯和本能不能给予他充分的指教。于是，大势所趋，就是在热狂或消极的听天由命之中寻找避难所。

热狂的人向内心的愤慨和挫败的压力屈服，并且寻求摊牌，因为他们不能承担那等待和动荡不定的不可忍受的负担了。消极和绝望的人则耸耸肩膀来接受生活的荒唐，而在一种屏绝一切努力、一切希望的机械而麻醉的生存中寻求遗忘。在所有这两种情况之下，人民对于他们的毁灭和文明世界的毁灭，日益听之任之。真的，人们感觉到，他们几乎在切望全局炸个粉碎，从此完之大吉算了。

这才恰恰是巨大的危险。这才是开朗的头脑、人道主义者和基督教徒的头脑，即希望理智和生命永存下去的头脑，现在必须最毅然决

然地面对的东西。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够說得定未来会带来什么，但是我們对于在我們控制之外的东西本来也沒有責任。我們是对現在負責，并且对将来事件由以发展出来的我們的現行行动和态度負責。所以，无比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握住我們自己，并下定决心，我們既不要抛弃我們的理智，也不要抛弃我們的人道；我們不要对于我們自己、或者对于人、或者对于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陷于絕望；我們要使用仍然很丰富的才能和智謀，并盡我們力所能及，把它們用于积极的和建設性的行动。我們既要抵制致命的消极和絕望傾向，也要抵制虛假的乐观主义和漫不經心——这二者同样有效地決定我們去接受灾难——的愚昧的誘惑。一句話，我們要象人那样行事，如果是基督徒，就象基督徒那样行事。

我們的問題是一个道德和精神問題。它是一个具有庞大而惊人的复杂性的問題。除了在其一切脉絡上来面对它，并对它做出我們所能做的事以外，我們别无抉擇。这是历史本身加到我們头上的义务，是我們的祖先半智半愚地遺留給我們的。但愿我們不是处在我們实际所处的境况中，或但愿我們置身于另一个世紀里、另一个行星上，这对我們沒有一点好处。我們决不能逃避当前的现实。我們决不能全都让自己冻僵，舒舒服服地墊居着度过行将到来的严峻岁月，以便在一个新世界里全无痛苦地苏甦过来。

但是，如果我們要按其本来面目来面对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承认它的真正性质。如果它是一个道德問題，它就包含着要求理智和自由作出的适当回答。它包含着要求以知識为基础的選擇。它包含着要求心甘情愿地研究、說服和传达。它包含着要求判断能力。它不但包含着要求个人在良心深秘处所下的判断，而且还要求政治表示和行动。

我們一定要作出判断和决断，但不只是作为为自己保留一顆清白良心这样一件奢侈品的个人，而且也作为承当起共同负担和共同責任的社会成員来这样做。退避到独善一己性灵的象牙之塔里而听任世界把它自己炸个粉碎，这是太容易了。这样的决断将是不道德

的，是承认失败。它将隱然意味着乃是热狂者那种公开的毁灭性狂怒的秘密同謀。

道德决断必須以充分的知識为基础。所以，科学家必須告訴我們有关炸弹和导弹的作用的某种可靠的东西。政治評論家必須使我們經常通晓战略的发展和为了我們的防御或毁灭而正在制定中的計劃。他必須告訴我們，在我們从群众性宣传工具上讀到、或者从政治家和政論家的演說中听到的那些花言巧語的保証底下，藏着的是什么貨色。我們必須知悉，世界上其余部分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在“敌人”土地上的我們的对手一方希望什么、害怕什么。我們一定要竭力牢記不忘：敌人同我們一样通人情，他不是禽兽或魔鬼。

最后，我們必須牢記我們自己想要發揮作用的方式，牢記在我們內心中涌起并确定性命攸关的决断的那些隱秘力量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学会把良心的自由呼声同偏见和憎恨的非理性強制区别开来。我們必須牢記客观的道德标准，牢記称得起是文明的每一个判断、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政治行为中所包含的智慧。除非我們甩开我們那消极的不負責任；屏斥听天由命地屈从經濟和社会力量；并且对于形成群众头脑的特色的那些机器和过程，拒不抱有不加疑問的信仰；否則我們就决不能这样来进行思考。历史是要由我們去創造的；而现今超乎一切的是，我們一定要力求恢复我們的自由、恢复我們的道德自律、恢复我們对那些在我們社会里造成生和死的力量的控制能力。

討論我們时代的那些决定命运的問題，是必不可少的。独立不倚的头脑已經毫不躊躇地这样做了，尽管群众的主流是趋向于日益馴順、日益无所作为地接受无意义的口号。在这本书里找不到这样的口号。这些作者也沒有提供輕易的解决办法。的确，他們并不自以为万无一失，能够超出一种可能結果成为徒劳的工作的严峻性而許諾任何东西。但是他們企求對我們的困境提供真誠而不存偏见的判断，而且，只要我們能够忠于尚未不可复得地失去的理智和智慧，他們的分析并不是不包含着极其重大的希望的。

但事实依然是这样：由于我們自己的过錯，我們可能把理智和智

慧二者都喪失掉，喪失掉文明和人道的世襲財產，而進入一個技術動物的史後世界。即使到了現在，也沒有理智仍能占上風的保證。但是我們一定要盡力而為，其餘的事就只能信賴上帝保佑了。

這本書里的這些論文，企圖突破思想障礙，打開合乎理性的展望。因此每一位作者都按他自己的方式假定，他所提出的問題，並非已經被偏見或被“思想控制”的非正式獨裁所永遠封閉了。如果我們假定這些基本問題都已得到了回答，那麼我們的劫數就定下來了。反之，如果我們認為，我們仍然有責任，而且，我們希望，也有時間來重新審查某些基本假定，我們也許能夠為政策的發展開辟出一條道路來，它將幫助後代制訂出一項完全建設性的與和平的解決辦法。

要作出我們最具有決定性的決斷，所依據的道德或政治原則，就它們本身而言，是相對簡單的；但這些原則以之為基礎的假定卻非常複雜。求助於正義和法律的傳統準則，並把這些準則應用於我們當前的局勢，以達到合乎邏輯的和頭頭是道的結論，這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們忘記了結論所以之為基礎的那些我們視之為公理的前提，事實上已經為武器技術的新發展所推翻，那麼，結論的頭頭是道本身，就會是與結論有關的最危險的事情了。的確，我們的道德或政治決斷正以之為根據的技術資料，可能受到業已首先喂進計算機的某些假定的深刻影響。於是就有一個極其嚴重的危險：我們那些最具有決定性的決斷，結果可能根本不成其為決斷，而僅僅是由一些推測和沒來由的假定所組成的循環論證的終點，在這些推測和假定中，我們不自覺地使論辯有利於我們自己的理論，有利於我們自己所中意的政策。

核“現實主義者”的書面和口頭聲明，看來就在為這一點上的嚴重憂慮提供根據。如果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過於認真地對待那些把熱核塵埃的毒害影響看作完全可以忽視而不屑一顧、每當他們考慮我們自己的城市可能遭到的破壞時盡量縮小核炸彈的破壞力的人的主張，那就是一大災難。而且，以諸如此類的推測為根據，一個對輿論的巨大部分握有真正決定性影響的道德家或政論家，有可能發表

一項贊成核戰爭的宣言，而這一判斷本身有可能成為使美國的全部政策擺動到從事先發制人的攻擊這個方向去的決定因素。較此甚至更加危險的是這樣一件事實：軍事頭腦的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先入之見，特別是對一種以教條主義和熱狂的政治信條為工具的政治威脅所作的過於簡單化的評價，將一定對高級軍事決策發生嚴重影響。

所以，無比重要的是創造出一種普遍的理性氣候，對全部生活保持一種豁達的、容忍的、機警的和人道主義的展望，這樣恰恰是為了使那些鹵莽和荒唐的假定不致在我們社會里過於暢行無阻。

這就是這些論文所想要做的事情。它們全都以各自的方式，抱着一副自由發問的頭腦來探討有關核戰爭的問題，尋求有助於推翻為大多數人——特別是在美國——所過於廣泛地接受的那些粗制濫造地假定的事實和原則。因此這些論文全都有的一種敦促和抗議的共同調子，就僅僅由於這一事實，它們就表明自己為保衛真正的民主、思想自由和政治行動自由而繼續戰鬥的意旨。

一切偏見之中最荒唐和最危險的一種，就是這樣一個流行的假定：任何人要是懷疑核彈乃是唯一的最終解決辦法的話，這件事本身就證明他有顛覆傾向。對於那些相信這個假定的人來說，這些論文是令人煩惱的。這些文章的作者開出了嚴厲的藥方。他們要求思想、耐心、面對危險的誠心，以便進入頭腦中新的未經探索過的領土。他們拒不滿足於否定論和毀滅，也不滿足於絕望，這種絕望偽裝為英雄主義，卻為上天啟示錄式的爆炸作着準備，在那場爆炸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合乎人情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價值，都將在放射性煙霧中上騰九霄。

由此可見，本書中的那些展望，在人道主義一詞的最深刻、最崇高的意義上，乃是人道主義的。它們超脫任何有限集團的利益，向着人自身最深厚、最決定性的需要高瞻遠矚。在這樣做的時候，它們至少骨子里是忠實於我們的文明建於其上的猶太-基督教的傳統的。如果我們看不見這些展望，我們就沒有希望了。此外再沒有其他合乎人性的出路了。

灭絕的道德观

刘易士·门福德

刘易士·门福德生于一八九五年。作家，讲师，大学教授。虽然主要工作是对建筑和城市规划进行社会方面的評論，但对文化和人文主义的爱好，驅使他就现代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著书立說。已出版的二十本书中包括有《艺术和技术》，《历史上的城市》，《人的环境》，《生活指导》，《城市文化》，《人类的前途》，《以精神健全的名义》，《技术和文明》，《人的演变》，《生存的价值》。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美国政府把大部分国家力量用于灭絕人类的准备工作上。这个离奇的計劃，曾經伪装成保証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合理的科学方法，但是都已經明显地失敗了。我們的核武器的輕率的爆炸試驗，仅仅是推銷核战争后果的样本，但是这已給人类带来巨大危害。公正地說，成为我們灭絕种族的試驗的最早牺牲品的，不仅是南太平洋島上的居民和日本的漁民，也有我們自己的孩子，甚而至于有我們孩子的未来的孩子。

几乎从一开始，我們在核武器方面的投資就是公开地針对一个国家——苏俄。我們的政府自己杜撰出来遏制俄国和仅用武力限制共产主义渗透的問題，但在关心这些問題时，我們却抛弃了最重要的人生目的。我們的领导人依据我国具有永久的核优势这一假設而制定的政治軍事战略現在已經完全破产了，这场交易清理起来，大概不可能沒有严重損失。

就当前情况看，未得俄国和中国的許可，作为联合国的代表并取

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我們都不能执行一次正当的警察活动。由于在朝鮮遭到他們拒絕，我們的战略家們所設想的那种有限战争，已經变成无限的屈辱，討厭的朝鮮停战就是証明，因为每一个原有的問題都未解决。我們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我們的絕對武器，而这种武器如同对于俄国和中国那样，对于我們和其他人类也是致命的。曾經公开承认这一无能状态的著名的將軍們，已被解除軍职。

这种情况使我們應該停下来想一想。在核武器和洲际导弹方面每一种科学进展，都不过是有助于扩大地球上的灾难，但我們的领导人却仍集中国家力量加速这种进展。我們的軍事计划使战争破坏性太大，不可能再打仗了。如果再发生战争，那就要灭絕人类，而只有灭絕人类，才能結束我們所促成的紧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为什么还繼續听那些把我們委身于冷战的錯誤意見呢？軍事和科学顧問們拿我們国家的生存在一批武器上冒险。他們已經輸了这场短見的賭博，甚至絕望到要使用这些武器；或者，如果使用这些武器肯定要失敗，而他們却閉起眼睛盲目相信可以借不使用这些武器来掩盖失敗，那末，根据甚么样的謹慎行事的准則，我們还把生命委托給他們呢？

有一些錯誤、誤算、誤会和強制的連鎖反应，已經把我們推入不可忍受的处境。是甚么东西把这样一种連鎖反应发动起来的呢？面对国家的錯誤，我們每耽擱一天，都会使危險加重，更难以摆脱它們。

走向制定一种新政策的第一步，是回过头来探索我們在甚么时候采用了灭絕人类的武器。必須記住，这种道德上的瓦解不是对俄国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更不是俄国拥有同样的武器这件事所硬塞給我們的。事实上，采用灭絕办法远在原子弹发明之前。

灭絕战略所依据的原理，最先由法西斯軍事理論家著名的杜黑將軍提出。象我們自己的塞維斯基少校那样，他相信把力量仅用于大量杀伤平民和摧毁民族抵抗意志的少数空軍，就可代替大批陸軍。采用不道德的青銅器时代总体战的办法，是法西斯主义准备重新使用恐怖和拷打作为政府工具的必然产物。当这些方式最初由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希特勒在华沙和鹿特丹使用的时候，它們在我們尚有